

思考「自我」中的亞洲一體化

由 ONE ASIA 基金會贊助、香港城市大學舉辦的「思考亞洲一體化」系列學術講座活動，不久前迎來高潮。ONE ASIA 基金會負責人佐藤洋治日前來到香港城大，除主持系列學術講座的閉幕式之外，也發表了以「自我、亞洲一體化」為主題的演說。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位等校方高層參與是次活動。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在佐藤看來，上世紀至今百餘年來，世界一直在經歷戰爭，未來如何，無法預測。現今的戰爭，已經從槍炮手段轉化為經濟等手段，例如一些強大的基金已經強大到足以左右一個國家的地步。又比如說，網絡的戰爭足以摧毀一些公共基礎設施，這種損害是極為巨大的。而且，在一般人群的構成中，如今的勝者與敗者的差別也愈來愈明顯。勝利的人是少數，失敗的人是多數。在社會體系中，一個人畢業於一所好的大學，也未必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這在全球比比皆是。故而，重新尋找人類互助的可能性，變得愈來愈必要。尋找沒有戰爭、和平相處的社會結構，雖然很難，但是接近這一目標是值得的。

思考亞洲的未來刻不容緩

亞洲，這是一個非常廣義的概念，涵蓋了東亞、舊蘇聯的中亞地區、東南亞地區等等。這種亞洲的概念，來自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亞非會議。亞非會議的意義在美蘇冷戰已經形成，如何在兩級爭霸的思維中尋求第三條道路。故而，佐藤本人也特別推崇中國的周恩來總理。

佐藤表示，ONE ASIA 基金會對大學課程進行資助，已經有三年多了。在 ONE ASIA 基金會的促進下，日本有三十五所大學結束了關於亞洲問題的系列講座；中國內地則有三十八所大學完成了系列講座；韓國有二十八所；香港則是三所。佐藤表示，三年之後，希望全球接受 ONE ASIA 基金會協助的講座大學，能夠達到三百五十所。基金會沒有接受日本政府和企業的資助，使得自身的立場中立、客觀，因而很受各國大學的學者和師生的歡迎。而系列的學術講座，都會有一個特定的主題，然後圍繞這一主題，由不同的學者進行講演。

特別是在當前中日關係較為緊張的情勢之下，中日兩國的民間文化與學術交流顯得特別重要。比起政府間的對話與溝通，中國與日本的民間情感對兩國的未來長遠發展影響將是巨大的。只有民間情感的爱友與穩固，才能夠確立起永恆的世代友好與和平的基礎。這也是佐藤



■近代日本對中國的影響巨大。



■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位與佐藤等人合影。

洋治與 ONE ASIA 基金會不斷在各個大學中推動交流與講座項目的又一巨大動因，也是一個刻不容緩的現實因素。

立足「自我」的視角

如何實現世界的和諧與穩定，佐藤認為，可以從自我、團體、國家的三個層面去看待。從自我的角度去看待外在發展；從團體、企業的角度去思考征服的問題；而國家民族的問題更是極為深刻和敏感，解決的難度也非常之高。某種意義上說，自我、團體、國家所構築的壁壘，雖然帶來的是社會的動蕩和不安，但也構築了人類社會至今的歷史。只要這三個層面的壁壘依舊存在，則未來的紛爭就依然會存在。而國族壁壘的突破，是一大關鍵。這種突破，可以理解為一種學習的過程，故而突破既有國別的藩籬，也可以理解為一種「畢業」。

佐藤將人類的地球比喻成是一個蘋果，不同的層次都是在思考人、生命的實體等問題。政治、經濟、法律等學科，持續深入地學習，所追求的應該是共通的和諧理念，這是佐藤的觀點。時代是不斷變化的，一棵樹從栽種到枝繁葉茂，所依靠的就是自然的變化。但是變化有表面和實質之分。最為根本的變化，往往是肉眼所無法看到的，例如養分肥料透過根鬚進入大樹。同樣，對於我們的現實世界而言，自我、人的實在，才是這個時代的根鬚。只有立足於自我的價值思考，才能夠確立長遠與穩固的和諧基礎。而團體、國家等問題的表現，相對於自我的思考，要顯得容易得多。

佐藤指出，自我往往是難以看見的，但卻是實實在在存在的。在亞洲的大學中，佐藤透露，自我往往存在心、大腦和身體中。無論是歷史上狼孩的故事，還是一些典籍的記載，都說明，人的自我意識，並不是天生具有的，而是從後天社會的環境中習得的。一個初生的孩子，面對的是「被命名」、「被稱呼」，久而



■佐藤洋治發表關於亞洲一體化的演說。

久之，一個姓名被傳遞了成千上萬遍之後，便被孩子接受，加之着裝、習慣等方面的培養，才逐漸形成了自我的身份和意識。因此，人體本身，並不等於自我。出生獲得的是身體，自我來自外在。並且在不斷的學習和灌輸中，自我被不斷強化和擴展。語言、文字、數據、社會身份與角色，都會對人的自我意識與身份定位產生影響。人體的細胞中並沒有標明民族與國別，故而同樣，地域、國族的身份認同，也是來自後天的賦予。人們往往也就接受了一種身份，接受了這一身份之後的規則和價值。

打破國別的藩籬

佐藤提到，1945年日本戰敗時，很多剛剛出生的日本嬰兒無法回到日本。他們被中國人撫養大，作為普通中國人的身份與意識生活到現在。後來，不少人得知了自



■今日東亞，卡通文化成為共同的生活構成。



■古代的東亞深受佛教的影響。

己血統上的日本人身份。由此可見，身體本身無法導出國家民族的信息；後天的生活塑造卻可以引出自我的意識。這一事例，對於人們如何從國家、民族的意識中「畢業」出來，具有很大的啟發意義。在日本的國會圖書館，雖然有一千多冊關於「人為何物」的書籍，但是要進行定義確實很難。七十億人，便有七十億個自我。

但是，舊有的國別、團體企業的藩籬，已經阻礙了全球一體化的角度，相互之間的仇恨與對立應當促使人們認真思考，如何超越後天賦予的意識回到本源。例如，在佐藤看來，參拜靖國神社的安倍，便依舊活在舊有的思維中。如何使中日兩國超越對立，將是值得兩國共同思考的問題。

佐藤說，他不僅去中日韓三國的大學演說，更會去一些開發中國家講學。在他看來，往往開發中國家的青年人，對未來更加充滿着希望。與歐洲聯盟相比，許多國家致力推動的亞洲共同體，則是一個多樣化的廣袤森林，有大樹、有小草，具有多種族、多文化的特徵。從這個意義上說，推動亞洲共同體，反而較為樂觀。中國、日本、韓國有過共同的文化思想淵源，歷史正反面的內涵，給予現代的啟示應當是積極的。而推動市民層面的分享經驗、共同的學術研究，都可以化解國族對立所帶來的仇恨。目前，經濟層面的亞洲一體化，其實已經是一個現實，增進了人員之間的往來。

和平主義的時代基石

在中國上海的馬當路上，有一處備受韓國遊客青睞的景點——「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1919年，為了悼念亡故的朝鮮末代君主高宗，也為了表達反對日本殖民統治、追求民族獨立與解放意志的決心，韓國的愛國志士於該年的三月一日發起了聲勢浩大的獨立運動，史稱「三一獨立運動」。這一民族解放運動的一個重要成果，便是韓國的獨立運動家們在中國上海成立了「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作為指導整個獨立運動的最高機關和體現獨立自決合法性的機構。1945年韓國光復之後，歷次憲法文本都在序言中明確表明：韓國的政治合法性來自於三一運動中建立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

在上海馬當路上的小弄堂裡，包括金九在內的一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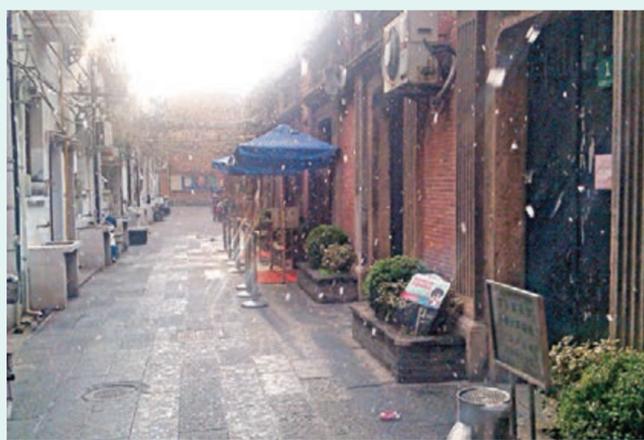
批韓國獨立運動家思考謀劃着自己祖國的未來。參觀過這一舊址的遊人——無論是中國人還是韓國人，都對那些當年的解放革命家們充滿了敬意。因為他們在如此艱難、危迫的情形下，從事着最為崇高和偉大的事業。在臨時政府舊址中，有一尊以韓國太極旗為背景的雕像。雕塑主題人物是非常著名的韓國愛國志士尹奉吉。他在1932年行刺在上海的日本軍政高官，最後英勇就義。1945年，拖着假腿在美國密蘇里號軍艦上，代表日本政府簽署投降文件的重光葵，腿部就是為尹奉吉所傷。

參觀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結合波瀾壯闊的韓國獨立運動史的全部歷程，可以看到，民族獨立、反對侵略、尋求解放是對錯誤殖民政策的一種抵制和修正，是尋求真正的和平。當年擊斃伊藤博文韓國獨立志士安重根，在舉槍射擊之後，高呼「大韓獨立萬歲」。安重根在哈爾濱行刺伊藤博文的壯舉，世人皆知。值得注意的是，被日本官方羈押期間，安重根留下了自己的政治遺囑——《東洋和平論》。在《東洋和平論》中，安重根的個人視角從韓國的獨立出發，譴責了日本殖民侵略的擴張政策；更為引人注目和發人深思的，是他認為，當韓國能夠實現解放、特別是中、日、韓三國能夠實現和平之後，三國應當思考如何形成堅固有效的共同體，發行共同的貨幣、自由貿易，進行全方位的合作。因此，韓國的不少學者不

僅僅將安重根視為是獨立運動家，也將其視為東北亞合作與一體化的早期倡導者之一。

安重根最終被當時的日本政府處決。他的東洋和平、中日韓三國合作與一體化的思想是否已經成為了現實，則是另一個話題了。不過，直到今日，在號稱奉行「積極和平主義」的日本政府眼中，安重根則依然是一個「罪犯」。但是安重根「所犯何罪」，則日本官房長官卻沒有講清楚。這也是一個巨大的陰影和幽靈。2010年，當時的日本民主黨政府曾經為殖民韓國而表示道歉，但是如今的自民黨政府卻視安重根為有罪之人。這不僅僅是日本政壇與社會的保守化，更是日本的國粹主義氾濫所引致的是非不分。

《送別》、《友誼萬歲》等近代化的學堂樂歌，在三國各自有着不同的版本，這標誌着中日韓三國曾經在十九世紀初有過共同的目標和理想。十九世紀，面對西方文明的強勢介入，中日韓三國都曾湧現出一大批勵精圖治、倡導東亞和平與合作的先知。中國的黃遵憲、梁啟超；在韓國正史中頗受好評的以金玉均為首的開化黨；日本的小野梓、岡倉天心，都曾經大力倡導亞洲主義。但是，這種美好的願望，最終為日本的擴張政策所毀滅，連「亞洲主義」一詞本身也成為了侵略主義的工具。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時代的巨大



■「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在上海的弄堂之中。

悲劇；明治文明開化早期的友愛與好感蕩然無存。如果日本的國粹保守人士對這一現象仍舊不思反省，則日本在戰後發展所積累的現代化標杆的心理優勢，仍將會被鄰國所拋棄。

和平主義確實已經成為了一種時代的基石。這一基石的本義便是反思。特別是對於曾經奉行過侵略政策的日本，應當思考：為何小野梓、岡倉天心的期待未能實現、為何中韓兩國的文化知識界對日本的觀感由明治早期的欽慕轉變為後來的失望、反感與仇恨。如今的上海，已經是東亞經濟一體化的中心之一，是中日韓三國進行經貿、人員、文化往來的重要城市。然則，回看上海的一處處當年中韓兩國民眾的抗日鬥爭史遺址，在今日高樓霓虹燈下的反省中，則如何避免悲劇的重演，永保和平的良機，將是每一個人都不得不面對的話題。

■文、攝：徐全



■太極旗成為當時韓國獨立運動的象徵。